

研究記要

多疑心態的結構背景：
城鄉環境與就業身份*

傅仰止**

* 本文實証分析依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期第二次(1996年)調查的問卷II資料。該研究計劃由國科會資助(計劃編號：NSC85-2412-H-001-010-B1)，瞿海源教授主持，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執行。文中主要研究概念經蕭新煌教授提示，並向瞿海源、張荳雲、伊慶春、章英華、陳東升、蔡明哲等教授請益，文稿依本刊匿名審查人惠賜之建議修訂，均受惠良多，謹此一併致謝。初稿曾發表於「國科會84-86學年度社會組專題計劃補助成果發表會」(87年1月16至17日，台北)。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文摘要

近年來台灣民眾對陌生人愈來愈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感容易發展成多疑心態，侵蝕人際互信的基礎，對社會秩序的維繫有害無益。本文從城鄉環境與就業身份兩項結構背景，探討多疑心態在日常生活各個層面上孕育的運作力量。實証分析依據「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三期二次問卷II資料(1996年調查，樣本數2831)，探討對陌生人的不信任感如何因為這些結構背景而異。分析結果証實都市環境特別容易滋生多疑心態，尤其是現居地的環境更加重要。成長地的城鄉環境並不直接引起特殊效應，但是將成長地和現居地兩者交叉分析後，顯示那些在鄉村地區成長，目前又住在都市的民眾，最不輕易信任陌生人。多疑心態的結構背景，也透過就業身份的若干特徵清楚展現。文中分別檢驗就業行業與部門，以及管理監督結構中的位階等因素。多疑心態在次級與三級行業、自雇又雇人、受雇於私部門、服務與事務人員、高階主管這些群體或分類中特別盛行。其中行業的區別最為關鍵，不但本身的效應鮮明，甚至還有力地制約著其他相關因素對多疑心態的作用。整體言之，城鄉環境與行業別這兩大因素，都獨立於個人特徵之外，代表著從日常生活和工作層面來了解多疑心態結構背景的社會機制。

關鍵詞：多疑心態、不信任感、城鄉環境、就業身份

一、研究議題：多疑心態的盛行與背景

多疑心態(涵義近似英文cynicism，或譯作不信任感，犬儒心態等)指經常懷疑他人，尤其對行為背後的動機加以質疑。隨著懷疑，連帶滋生猜忌、怨恨、敵意。當事人身處緊張、挫折的環境，卻無力向其來源吐訴這些情緒，不能直接針對其不滿有效紓解。如此經歷不是偶發事件，而常存於日常生活當中。這種不誠摯的心態雖然是調適環境的自我防衛，卻反映出個人信心不足，對工作價值存疑，妨礙了創新機制；對工作團體或組織而言，則不利於主管下屬或同事間的關係，不但造成成員跟組織的疏離，也間接削弱了工作效率或企業的生產力(侯崇文 1985:40; Regoli et al. 1979; Kanter and Mirvis 1989: 301)。

就整個社會來看，如果多數社會成員不相信人的善意、懷疑他人別有居心，又容易破壞人際關係、侵蝕社會互信的基礎，對社會秩序的維繫有害無益。在不良的大眾文化影響下，社會風氣如果陷於吹毛求疵，人際間誠信的基礎薄弱，不但展現出社會心理不健全，嚴重者更可能阻礙民主制度及其精神的真正發展。以近數十年來的美國社會為例，人民對政府、法律、政治、大企業、公共事務參與這些制度與事務逐漸不懷好感，政治醜聞和政治文化上的犬儒主義滲入人心，民眾也不輕易信任他人(Lipset and Schneider 1987; Goldfarb 1991)。

台灣社會近十餘年來歷經民主化轉型，威權體制不復具有約束力。隨著經濟發展，貧富差距持續加大，政治衝突愈趨明顯，

社會治安敗壞，人民對既有制度和人際關係的信任感日漸微弱。不只是政治人物爾詐我虞，檢警所代表的司法制度信用不足，傳播媒體對特定、偶發社會事件也常傾向猜測臆想。這些現象，容易反映在多疑的社會人心。依據九〇年代初期的實証依據，台灣民眾的多疑猜忌傾向已經不下於美國、香港等社會；到了九〇年代中期，這股不信任他人的人心益趨瀰漫（蕭新煌、尹寶珊 1996；張荳雲 1997；傅仰止 1992）。例如在九〇年代初期，大約有一半民眾認為不能輕易信任別人。到了五年後，抱持同樣多疑心態的比例已經升高到將近八成（傅仰止 1997；伊慶春主編 1993；瞿海源主編 1996）。社會上普遍難以相信單純為善的動機，反映出社會心理不健全的一面。從這項負面的社會人心來衡量，未嘗不是判斷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

從大環境的鉅觀層面或時代變遷來分析多疑心態，有助於了解整個社會的發展，如何經由經年累月的政經環境，以及特殊事件，對社會人心產生不良影響，適合在不同社會之間作比較研究。除了這項鉅觀途徑之外，另有一項重要途徑來探討多疑心態的源由，藉由社會內部不同群體的變異情形，反映日常生活各個層面上的結構性運作力量（Kanter 1989:28）。在層層因素當中，個人人口特徵、家庭生命週期、社會經濟地位都能一一揭示各種社會機制的運作力量。但是多疑心態的外在結構背景，能夠更廣泛地從城鄉環境和就業形態來探索。前者呼應都市社會學探討人口多、密度高、異質性強的都會生活特質，後者從工作性質或工作環境分析特定的人格形塑。兩者分別從周遭的日常接觸經驗，

剖析在城鄉和就業結構兩大體系中，有什麼樣的位階特質助長多疑心態。從這兩大體系來探討多疑心態的結構背景，也適切地承續了相關理論文獻的傳承。

（一）城鄉環境

都市生活如何形塑人際間的不信任或猜忌多疑，在都市社會學的傳承中向來是論述的一項重點。現代都會由於人口眾多、密度高、人口組成多元而異質化，因而提供了特殊的人際互動情境。都市人面對錯綜複雜的種種外在刺激，不得不調整對外在世界的適應方式，以淡漠保留的態度來應對，免於生理上和心理上負荷過度 (Simmel 1903; Wirth 1938; Milgram 1970)。

這項都市生活適應的古典論述，大致呼應了民間流傳的都市意象，尤其是都市生活容易造成不安、恐懼、疏離，成為一般論述的刻板印象。這種意象經過後續的實証研究，得到更精緻而翔實的詮釋。其中最重要的修正，是針對互動情境及對象作更清楚的劃分。都市生活中讓人不安、難以把握的社會情境，多半發生在不熟悉的公共場合；令人心存疑慮、謹慎應對的互動對象，則以陌生人群為主。不論國內外的研究，幾乎都一致發現都市人和鄉下人沒什麼兩樣，在自己熟悉、經常交往的社會圈子裡，都可以享有親近互信的人際交往；可是對熟悉圈子以外、沒有特定關係的人，則表現出相當不同的行為態度。都市人明顯的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覺得寂寞，對不熟悉的都市環境存有戒心，覺得不應該隨便相信陌生人，即使是自己的鄰居，最好也要小心點才好 (Fischer 1981; 伊慶春、章英華 1989; 傅仰止 1995)。可靠

的對象在陌生人群中畢竟可遇不可求，而一般人也了解生活在千萬張陌生的臉孔中間，不知道那一張才真正可以信任（莊慧秋 1985:33）。這種多疑心態，幾乎成爲跟陌生人交往的都市法則。

都市人不容易輕易信任一般人，未必就反映了特殊的「都市人格」傾向。這種趨勢，或許也可以歸因爲情境式的反應或心態。因爲都市裡複雜異質的外在結構背景使然，讓人不得不爲了保護自己，而小心翼翼。複雜的外在互動情境，不只是建構在陌生人雜處的公共場合，還因爲都市裡形形色色的群體並存，在眾多副文化並存的情況下，對那些成長背景、生活型態、個人品味、甚至價值觀念迥異的「異類」，更是沒有把握，更得小心行事。應對之道除了要對接觸的情境好好過濾之外，「小心、存疑」就幾乎成了合理有效的反應（Fischer 1975, 1995; Lofland 1973, 1989; Karp et al. 1991）。

如果都市環境對人的影響只限於情境上的反應，多疑心態的都市結構肇因可能就是短暫、可變動的。換言之，都市人一旦脫離異質而複雜的外在結構制約，應該就可以鬆弛多疑猜忌的心情，回歸互信的人際交往。這種「都市心態」的起伏，可以另外從城鄉遷移所引起的「文化衝擊」觀點來加以反証。待人處事的特殊心態可能歸因於都市外在環境，也可能源起於城鄉之間的外在環境差異，教人特別謹慎。如此外在環境差異所引起的衝擊，是討論「容忍異議份子行使公民權」經典作中認真考慮的一項結構背景（Stouffer 1955）。依據近年的台灣實証研究，這項「衝擊」經驗並不像都市環境本身那樣，能夠真正孕育容忍異己的正

面心態(傅仰止、伊慶春 1994)。至於像「多疑心態」這種外在結構的負面效應,是否單純在都市環境中產生,還是也肇因於城鄉間的遷移?一旦離開都市環境,是不是就能夠摒棄在當初那種外在結構制約下所發展出來的多疑心態?這些問題,都是在探討基本的城鄉差異之外,所必須持續深入分析的議題。

(二) 就業身份

多疑心態的另一項研究重點,集中在探討工作形態的結構肇因,以及組織內的員工士氣與工作績效。工作形態跟人格或人生觀之間有何關聯,組織內的信任或多疑又如何影響效率,這些議題及研究成果都對多疑心態的剖析有其貢獻。多疑心態似乎反映著「信任」的另一面,可是「不信任」本身可能只是一種單純的信念問題,而「多疑」除了信念之外,還蘊涵著情感成份,容易讓人沮喪、失望,直接懷疑行動者的動機 (Andersson 1996)。對組織內的管理者來說,「信任」是組織得以發揮正常功能的基礎,而不信任組織運作或管理階層,甚至發展到多疑地步,恐怕要比不滿意工作狀況這種問題來得更為深沈 (Regoli et al. 1979:187; Goldner et al. 1977)。這一點也呼應前述多疑心態對探討健全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依據既有研究文獻,工作形態的眾多面向(包括工作性質和工作場合)跟員工的人格特質發展息息相關。例如工作上的自主程度,明顯有助於肯定內在價值和跟人性有關的價值觀,也能夠提升對當事人本身和對社會的自我導向人格;工作收入和隨之而來的社會經濟地位,通常在探討多疑心態時也是值得注意的結構

背景因素 (Mortimer and Lorence 1979; Kohn and Schooler 1982)。可是綜觀文獻，跟多疑心態探究最為相關的工作結構要素當中，最關鍵的還是集中在行業類別、自雇或受雇狀況、監督管理體系中的位階等。這些要素，也就是本文所簡稱「就業身份」的實質意涵。本文依據這項重點，並顧及資料範圍，在探討城鄉環境這項結構背景之外，將集中在分析工作形態中的就業身份如何制約多疑心態的發展。

文獻上顯示多疑心態最容易出現在服務業。服務業通常依靠層級複雜的網絡或結構來運作，服務業的工作無法以純粹個人的喜惡偏好來行事，而必須跟周遭不同環節中的他人相處。在這種複雜層級或網絡中，特別容易由異質的環境注入引起多疑的人事 (Andersson 1996)。尤其是基層服務業的員工身上。基層服務業者需要經常跟公眾接觸，可是許多服務的工作吃力不討好，既沒有自主權，不容易得到主管上司和顧客的欣賞感激，工作又經常繁雜過重，比較難從工作本身得到自我肯定與滿足。此外，由於經常跟大眾接觸，比其他人更有機會接觸到那些本身就不信任人的服務對象，服務對象如果有不滿的地方要抱怨，通常也會直接對這些第一線的員工出氣 (Kanter and Mirvis 1989)。因此，這種工作性質不免讓他們對人際交往抱持比較悲觀的看法。

若干特殊的服務業又特別容易滋生多疑心態，例如商界往來常常需要以信用為基礎，自己人或熟悉的伙伴容易靠著信用來推動業務，對「外人」則普遍存有戒心 (Kiong and Kee 1998:84-90)。又例如治安保全業、警察或警衛這類工作需要接

觸、應付許多作惡的不良手法；不但防範或處理犯罪不法事繁重，對負面的社會百態接觸也多。一旦看多了人性的醜陋面，不免懷疑人與人之間還有什麼真正可以互相信賴的關係。此外，經常管理罪犯，一方面要應付不合理的工作期望，又常常遭人懷疑跟黑道掛勾。這類基層服務人員在這種工作情境壓力下，因而對他人的善意最爲懷疑(Klinger 1997；Poole et al. 1978；侯崇文 1985)。警察、治安、保全、警衛、獄卒這些工作，於是成爲研究行業性質與多疑心態關聯的佳例。

除了行業的區別之外，在整個就業結構中的位階也跟多疑心態相關。在結構性的工作條件中，所有權和官僚化組織都容易加深不信任他人的傾向。自雇者必須對自己的事業特別謹慎，有僱用員工者更是在意管理積效。而在管理制度嚴格的工作環境中，管理員工或對待他人的準則又通常不能只依靠互相信任(Kohn and Schooler 1982: 1259-1275; Kanter and Mirvis 1989)。

這種時代背景是否更加重管理者的多疑心態，值得探討。特殊的從業身份和監督管理位階，固然會加深多疑心態，是否就因此適用於各個行業？如上述，從行業別可以分辨出多疑心態的盛行趨勢。自雇或管理監督位階所造成的多疑心態，又如何因爲行業別有所變異？這些議題，必須一併配合探討。此外，就業身份所引起的多疑心態，一旦考慮了上述城鄉環境的影響之後，會有什麼樣的變化，也值得進一步分析。

二、資料與方法

本文依據上述文獻探討，一併分析城鄉環境與就業身份在形塑多疑心態上的效應。兩者經由單獨分析，可以突顯各自所代表的結構性制約力量；最後又合併考量，以兼顧分析多疑心態結構背景的完整性。上述都市社會學傳承所強調的「都市效應」，容易遭人評為虛假效應。其中理由除了人口組合因素外，還涉及都市環境中特別容易造就特殊的就業形態，例如自雇的就業身份。本文為了將這些互動效應列入考慮，將進一步檢驗兩種結構背景的關聯或約制力量。

實証分析所依據的資料，取自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期第二次的問卷II。該次調查以工作經驗、家庭、民間社會為主題，於1996年暑假期間進行訪問。由於訪問的內容大半環繞在工作歷程，所以樣本範圍以工作人口為主，限於25歲到60歲之間，選取樣本時，也以有工作經驗者為優先，是該次調查與其他變遷調查樣本最大的不同（瞿海源主編 1996）。分析用有效樣本數共2,831，樣本特質除了年齡和就業人口在抽樣時特別考慮外，並沒有在其他特徵上再作特別考量。

（一）依變項

本文分析的依變項為多疑心態，為了測度多疑心態的確切意涵，參考在國內外歷經有效測試的「犬儒態度」或「不信任態度」量表，經過修訂和預試過程，擬定下列問題及所屬四題問項：「下面這些話是對社會或一般人的看法，請問您自己會不會覺得這樣？」

1. 社會上有許多人不是真正關心別人，表面上卻裝作關心的樣子。
2. 大部份人要是覺得對自己有好處的話，都會跟別人講點假話。
3. 人跟人之間愈來愈能夠互相信任。
4. 現在社會很亂，連鄰居都不能信任。

除了第三題外，這些問項都從同一方向來測量人際間互相不信任，或者對整個社會的人際交往多疑悲觀的感覺。各題的選項包括很覺得、還算覺得、不太覺得、很不覺得、不知道，共五項(問項來源參考 Kanter and Mirvis 1989; 傅仰止 1992; 伊慶春主編 1993)。

從表一的次數分佈來看，大部份台灣民眾對陌生人都心存戒懼。跟前幾年的調查比起來，多疑的傾向愈來愈明顯(傅仰止 1997)。四題問項經過因素分析(取主成份因素法)，再化為因素分數，建構成一項綜合的多疑心態指標。這項指標的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對人愈多疑，反之則愈不多疑。該項因素分析的結果也摘錄於表一右方，固有值(eigen value)為1.77，解釋44.1%的變異量。四項問項的信度係數為 0.55。

表一：多疑心態變項的次數分佈與因素分析摘要

測量多疑心態的原始題目	答項百分比分佈					因素分數
	(1)	(2)	(3)	(4)	(5)	
1. 社會上有許多人不是真正關心別人，表面上卻裝作關心的樣子。	36.0	44.0	13.2	1.7	5.1	0.77413
2. 大部份人要是覺得對自己有好處的話，都會跟別人講點假話。	30.3	48.1	15.1	2.1	4.4	0.78670
3. 人跟人之間愈來愈能夠互相信任。	3.9	18.1	50.3	24.2	3.5	-0.55703
4. 現在社會很亂，連鄰居都不能信任。	11.8	28.3	44.6	11.8	3.5	0.48722

註：答項號碼分別為(1)很覺得，(2)還算覺得，(3)不太覺得，(4)很不覺得，(5)不知道。因素分析的固有值為1.77，解釋44.1%的變異量，樣本數為2830。

(二) 自變項

由於依變項「多疑心態」經過轉化為標準化分數，資料分析方法以複迴歸為主。依照本文研究架構，主要的自變項有兩大類。第一，「城鄉環境」以現居地和成長地兩者的都市化程度為代表，而這兩項又根據受訪者自我認定的標準，以及研究者依據既有客觀標準所訂定的都市化等級，分別嘗試採用不同的分類(詳細分類過程在下文分析時說明)。第二，「就業身份」以行業別、自雇或受雇身份、職位、監督管理位階這四項指標來衡量，以代表受訪者在就業結構中的身份與位階。各項自變項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均列於表二。這些變項的分類標準及操作過程，在下節分析時將另行詳細說明。

表二：變項名稱及摘要

變項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變項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一、依變項			三、控制變項		
多疑心態	.000	1.00	性別		
(最小值 -3.92, 最大值 1.96)			男	.512	.49
二、自變項			女	.487	.49
成長地都市化程度			年齡組 (1-4)	2.540	.92
主觀界定			(%)		
鄉村	.557	.49	25-29 (1)	13.8	-
小鎮	.218	.41	30-39 (2)	35.0	-
都市	.223	.41	40-49 (3)	34.5	-
客觀界定			50-60 (4)	16.7	-
鄉村	.355	.47	父親族群別		
城鎮	.450	.49	閩南	.749	.43
核心都市	.194	.39	外省	.127	.33
現居地都市化程度			客家	.094	.29
主觀界定			原住民	.022	.14
鄉村	.311	.46	婚姻狀況		
小鎮	.240	.42	未婚	.126	.33
都市	.448	.49	已婚有偶	.797	.40
客觀界定			離婚	.041	.19
鄉村	.217	.41	喪偶	.034	.18
城鎮	.527	.49	教育程度 (1-4)	2.366	1.15
核心都市	.255	.43	(%)		
就職行業			國小或以下(1)	33.6	-
初級	.076	.26	國初中 (2)	18.0	-
次級	.440	.49	高中職 (3)	26.4	-
三級	.482	.49	大專 (4)	22.0	-
自雇或受雇狀況			個人收入 (1-6)	3.737	1.59
自雇有雇人	.086	.28	(%)		
自雇沒雇人	.227	.41	第一層 (最低)	13.9	-
受雇私部門	.537	.49	第二層	10.3	-
受雇公部門	.148	.35	第三層	18.3	-
就職職位			第四層	14.7	-
工人	.487	.49	第五層	31.2	-
服務及事務	.270	.44	第六層 (最高)	11.6	-
專業監督	.241	.42			
管理監督位階					
沒有管理人	.743	.43			

表二 (續)：

變項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變項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低階管理	.128	.33			
中階管理	.083	.27			
高階管理	.044	.20			

註：(1) 樣本數為 2,831；除了特別標明之外，各變項均化為虛擬變項，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1。(2) 若干自變項由原有的等距量表簡化為等級量表 (例如年齡以年齡組代表)，其他則以原有的測量單位呈現等距量表 (例如教育程度、個人收入)。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期第二次調查，1996年，問卷二。以下各表皆同。

(三) 控制變項

本文重點限於這兩類結構背景因素，不考慮其他個人或家庭特徵的效應。但是在迴歸分析裡，都將這些個人特徵納入為控制變項，以避免人口組成因素的干擾。這些控制變項跟上述主要的自變項一樣，大部份化為虛擬變項，以突顯變項中各類屬的單獨效應。例如性別以女性 (佔48.7%) 為對照組，彰顯男性的效應；父親族群別以本省閩南人 (佔74.9%) 作為對照組，襯托出外省、客家、原住民的效應；婚姻狀況的對照組則是未婚者 (佔12.6%)。為了簡化表列形式以及控制變項的分析，其他的變項在經過初步分析，確定沒有複雜的非線性效應之後，則維持原有的等級分類 (例如教育程度分為四類，個人收入分為六類)，或者將連續變項轉化為等級變項 (例如年齡分為四個年齡組)。¹ 迴歸分析時各變項所用的對照組，都列在每個表的下方。

¹ 本文所用的「個人收入」指標是由受訪者自評的主觀排序指標。受訪者依自己的判斷，將個人收入在整個社會中的排序由第一層 (最低) 到第十層擇一回答。由於第七層及以上的合計比例過低 (3.32%)，在實際分析時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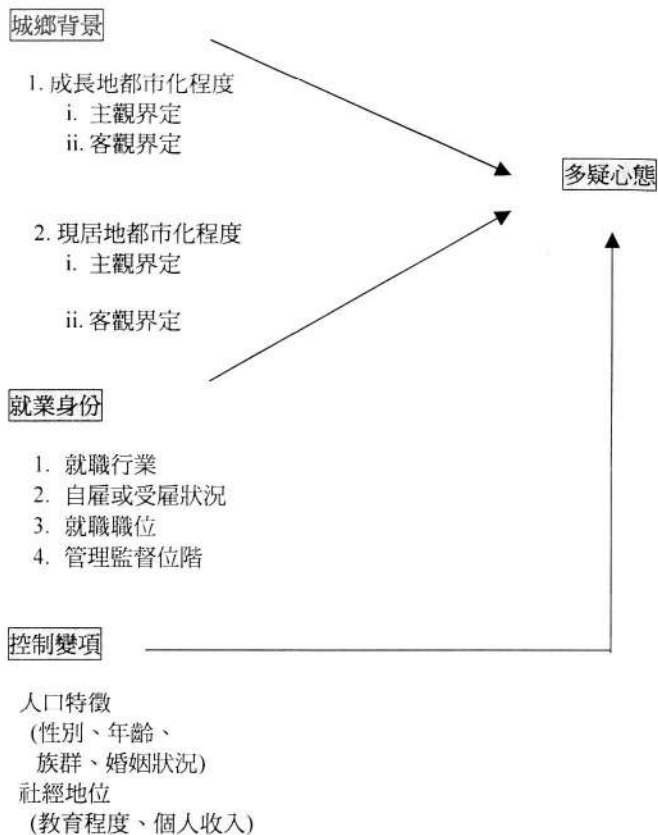
簡言之，本研究的架構重點在於從城鄉背景和就業身份兩大類因素，分析多疑心態的變異。個人的人口特徵和社經地位等，則作為迴歸分析的控制變項。這些因素之間的關聯如圖 1 所示。

三、城鄉背景與多疑心態

一般分析城鄉背景，大多以現居地的都市化程度作為標準。可是都市生活所孕育的特殊社會心理，能否歷經歲月而不衰退？在都市生活中所展現出來的多疑心態，是只限於當下情境的一種反應，離開都市環境後就會消失無形？還是這種心態容易久留，一旦形塑，就不容易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而減弱？這些問題都需要藉助分析成長期的城鄉背景，才有可能釐清。

不論是就現居地或成長地而言，多疑心態的都市效應都必須藉由城鄉比較來驗證及突顯，但是城鄉分類的標準一向難以界定。本研究兼顧主客觀標準，分別以受訪者主觀認定的都市化等級，以及研究者綜合建構的客觀分類，作為探討城鄉別的依據。主觀標準由受訪者分別對自己成長地（15歲以前住最久的地方），以及現居地直接歸類為鄉村、小鎮、都市三者之一。客觀分類則依據從多項人口及社會經濟指標所建構出來的都市化等級，先將鄉鎮市區分為八等，再簡化為鄉村、城鎮、核心都市三等。其中核心都市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四大都市，城

入第六層，代表自評收入最高的一層。下文所指個人收入都以這項操作定義為準。



圖一：研究架構

鎮則指其他都市化程度較高的鄉鎮市（詳細分類標準及過程參閱傅仰止 1995）。主客觀分類之間關係密切，成長地的主客觀分類之間相關係數為 0.60，對現居地的主客觀分類之間，也呈高度相關（ $r = 0.62$ ）。兩種分類之間多所重疊，原在預料之中，可是兩者畢竟還是有相當差距，顯示分開來分析自有其意義。

表三以多疑心態作為依變項，列出城鄉背景變項和所有控制變項的效應。不論是以主觀分類（行 1 到行 3）還是客觀分類（行 4 到行 6）來測試城鄉背景的多疑心態，控制變項所展現出來的效應都沒有什麼明顯的改變，例如多疑心態明顯的出現在年輕、離婚、個人收入低這些群體身上。城鄉效應也相當一致：跟鄉村居民比起來，城鎮和都市居民明顯地對陌生人多存疑心。可是比較兩者的效應強度，還是分辨得出差距：不論從成長地還是現居地來衡量，主觀分類下的都市效應，都比客觀分類的都市效應來得微弱。因此，基於人口社經指標所界定的客觀都市化等級，更能區辨出居民多疑心態的盛行程度。

再比較成長期和現居地兩者，可以發現後者的都市效應強烈得多。依主觀分類，小鎮和都市的現居民眾都明顯的要比住在鄉村者更為多疑（行 1）。可是成長期住在小鎮或都市，現在未必就比較會以多疑心態看待陌生人（行 2）。當現居地和成長地兩者一併納入迴歸分析，現居地都市化的效應不減反增，而成長地都市化仍然顯現不出明顯差異（行 3）。

從客觀分類所能區辨的都市效應更加明顯。現居地的高都市化，明顯的會助長多疑心態：不論城鎮或核心都市居民，都比

鄉村居民更不信任陌生人 ($p < .001$, 行 4)。成長期住在都市化程度高的地方,也是目前對人多疑的一項肇因,不過效應不如現居地明顯。一併考量後(行 6),這種成長地都市化等級的效應幾乎消失;多疑心態的城鄉背景,主要還是源自現居地。因此,多疑心態雖然跟成長的時期住在什麼地方有關,這種關聯其實是藉由現居地的都市化來展現。都市生活所孕育的早期學習環境固然重要,對多疑心態這種負面的社會心理所能產生的效應畢竟有限(Stephan and McMullin 1982)。反之,目前身處的都市生活環境,的確是多疑心態的一項重要結構背景因素。這點發現,從居民的負面心態肯定了文獻上探討都市社會心理特質的傳承。

表三顯示多疑心態不受到成長地都市化程度直接影響,卻沒有揭示城鄉遷移所引起的效應為何。台灣民眾在城鄉間遷移頻繁,例如成長期在鄉村度過的,後來可能又經歷不同的都市生活;而目前住在核心都市的居民,又很可能有著相當不同的城鄉背景。成長的時候城鄉背景未必重要,可是後來的變化呢?同樣出身於單純的鄉間背景,一旦進入不同都市等級,會對陌生人有什麼不一樣的反應嗎?同樣是大都市的現住居民,又會因為所經歷都市化洗禮的久暫,而在多疑心態上有所差別嗎?這些問題可以藉由表四的交叉分析獲得部份解答。

表三：多疑心態的城鄉背景迴歸分析(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自變項	主觀分類			客觀分類		
	(1)	(2)	(3)	(4)	(5)	(6)
男性	.050	.053	.061	.063	.055	.067
年齡組	-.115***	-.101***	-.115***	-.104***	-.102***	-.104***
族群身份						
外省	-.017	-.009	-.021	-.009	-.013	-.006
客家	-.067	-.076	-.069	-.060	-.057	-.058
原住民	-.421**	-.452**	-.385**	-.380**	-.413**	-.352**
婚姻狀況						
已婚	.134*	.117	.142*	.109	.115	.110
離婚	.364**	.337**	.362**	.337**	.319**	.313**
喪偶	.152	.127	.159	.109	.195	.176
教育程度	.027	.030	.022	.025	.033	.028
個人收入	-.066***	-.058***	-.068***	-.063***	-.058***	-.066***
成長地						
小鎮/城鎮	--	-.018	-.063	--	.109*	.017
都市/核心都市	--	.079	.052	--	.093	.015
現居地						
小鎮/城鎮	.142*	--	.167**	.244***	--	.242***
都市/核心都市	.125	--	.133*	.220***	--	.204
常數	.266*	.289**	.272*	.145	.225*	.141
調整後R平方	.028	.023	.030	.031	.025	.031
樣本數	2467	2482	2431	2526	2422	2421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各變項的對照組包括：女性、本省閩南、未婚、鄉村，以下各表相關變項皆同。

表四A以成長地和現居地的都市等級分類互相對照，分別列出各交叉類別的多疑心態分數。²從這些平均分數來作判斷，城鎮和核心都市的環境都要比鄉村讓人容易對陌生人起戒心。這點

² 依據表3分析結果，客觀分類的現居地都市化等級比主觀分類更能有效區辨多疑心態的高低，因此，表4以後的都市化等級一律採取客觀分類。

差異跟前述發現一致；比較特殊的發現，則是在交叉後的結果。在各項交叉分類當中，最能夠信任陌生人的，首推兩個時期都住在鄉村的那些人。反之，對人最多疑的，並不是一直住在大都市的居民，而是經歷過不同都市化等級極端的人。那些在鄉村成長，後來前往核心都市的居民，是大都市裡面對陌生人最小心翼翼的一群（多疑分數為 .162）。再看另一極端：在核心都市成長，目前住在鄉村地區的一群，則不但在目前的「鄉下人」裡面最不信任陌生人，也比那些留在都市的人更為多疑（多疑分數 .308）。

表四：多疑心態的成長地與現居地城鄉背景

A. 成長地與現居地交叉分類的多疑心態分佈

現居地	成長地			合計
	鄉村	城鎮	核心都市	
鄉村	-.224 483	-.090 94	.308 25	-.181 602
城鎮	.013 327	.071 924	.079 170	.059 1421
核心都市	.162 152	.031 206	.009 332	.049 690
合計 (平均值) (樣本數)	-.082 962	.052 1224	.046 527	.003 2713

表四：(續)

B. 迴歸分析 (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自變項	現居地			成長地		
	鄉村 (1)	城鎮 (2)	核心都市 (3)	鄉村 (4)	城鎮 (5)	核心都市 (6)
現居地						
城鎮	--	--	--	.300***	.097	-.267
核心都市	--	--	--	.389***	.043	-.369
成長地						
城鎮	.121	-.007	-.117	--	--	--
核心都市	.629**	.028	-.125	--	--	--
常數	.187	.310	.637**	.238	.211	.787*
調整後 R 平方	.072	.022	.031	.053	.016	.060
樣本數	492	1313	616	840	1108	473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兩類城鄉變項的對照組都是「鄉村」；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族群別、教育程度、個人收入，變項名稱及係數皆未列出。

表四B進一步控制人口組合的特徵，再檢驗上述發現。在個人特徵相當的前提下，現在住在城鎮和核心都市的居民，都不會因為早期的都市經驗，而在多疑心態上有明顯差異（行2、行3）。可是對鄉村的現有居民來說，早期的都市化經驗就格外重要：跟那些一直待在鄉下的「真正鄉下人」比起來，在大都市成長的「鄉下居民」所呈現出來的多疑傾向強烈得多（ $b = .629$, 行1）。

再從成長地的角度來判斷遷移效應（表四B的行4到行6）。對那些在鄉村成長的人而言，現居地的都市化程度顯然是分辨多疑心態的有效指標：不論目前是住在城鎮或核心都市，這

些從鄉下來的人都要比那些留在家鄉的同鄉要來得多疑（迴歸係數大於 .300, $p < .001$, 行 4）。這種遷移效應顯著而特殊，並沒有在成長地的其他都市分類中出現。

一般說來，都市環境固然是滋生多疑心態的重要結構背景，從都市到鄉村，以及從鄉村到都市這種居住環境上的變化，也是探討多疑心態時不可忽略的外在因素。前者發現足以呼應都市生活對其他社會心理效應的影響，例如容忍態度和對公共道德、公共秩序的觀點（傅仰止、伊慶春 1994; 傅仰止 1995）。後者有關城鄉遷移所造成的明顯效應，也是探討多疑心態和相關社會心理時，必須同時考慮的結構背景。這些有關城鄉環境的研究發現，一方面反映出結構面的靜態效應，另一方面也彰顯了經歷不同背景後所呈現出來的後果。不論從靜態或從動態來探索結構背景，都肯定了城鄉環境對滋生多疑心態的外在力量。

四、就業身份與多疑心態

就業結構和城鄉背景一樣，都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對個人形塑重要的外來制約力量。依前述文獻回顧的要點，本文將這種結構制約力量置於就業身份來探討。由於若干就業結構上的特徵在都市中才得以真正展現，所以就業身份的分析最後還是必須考慮城鄉環境。

本文所探討的就業身份包括四項：行業別、就業部門類屬、職位、管理監督體系中的位階等。前兩項從就業從屬來彰顯就業

結構上的特色，後兩項則從在結構中所佔據的位置，檢驗結構因素如何形塑多疑心態。

行業別的分類，是從原有九項分類中，合併為三類。其中初級行業包括農林漁牧、礦業及土石採取業；次級行業包括製造、營造、水電燃氣業；三級行業則包括運輸通信、金融保險、工商服務業、公共行政及其他服務業。迴歸分析時均以初級行業作為對照組。就業部門類屬指自雇或受雇狀況。分析時依原有細分類的性質以及樣本分佈情形，分為四項：自雇同時雇用別人、自雇而且沒有雇人（包括為家裡工作，不論有沒有領薪水）、受雇於私部門、受雇於公部門（包括政府機構、公營機構、非營利機構等）。分析時的對照組是公部門的受雇者。由於樣本以就業人口為主，所以沒有工作的比例極低（不到百分之一，參閱表二）。

職位分類參照原有的十大類別，參考各類別所需要的專業或技術層次，進一步合併為三大類。第一類「工人」指技術層次較低的技術工、操作工、組裝工、及其他體力工人（包括初級行業的工作人員）；第二類「服務及事務」包括售貨員及其他事務、服務工作人員；第三類屬於專業技術層次最高的「專業監督」人員，範圍包括民意代表、行政及企業主管及經理、以及其他專業人員和技術員等（原有分類參閱瞿海源主編 1996: 286-296）。

至於管理監督位階的分類，則直接取自問卷中的管理人員位階。除了沒有管理任何人這一項外，低階管理人員指「有管理他人，可是下面所管理的人沒有再管理其他的人」；中階管理指

上面和下面都有人管理其他的人；高階管理則指上面沒有人管理其他人。這四類依照管理監督體系中的位階，排列成清楚的等級。

表五分別對這四類就業身份因素作複迴歸分析，最後再合併。表五上方所列的個人特徵，跟表三結果類似，在年齡、族群別、婚姻狀況、個人收入上展現出明顯的多疑心態效應。在這些個人特徵相當的情境下，多疑心態也隨著就業身份的各個因素而有明顯差異。首先，行業所造成的多疑心態變異相當明顯。不論是次級行業或三級行業的從業者，都比從事農林漁牧礦業這類初級行業的要多疑（行1）。其中尤其是三級行業（服務業為主）的多疑傾向，更比次級行業來得強烈。這點發現，佐証了文獻上所討論服務業與多疑心態的密切關聯。不過除了服務業之外，次級行業中的製造業員工也比初級行業者不輕易信任人。行業別上的差異，獨立於從業者的性別、年齡、族群、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和收入這些個人特徵之外。也就是多疑心態會因為行業別而有差異，並不是因為從業者的人口組成結構所造成，而更可能是由於各行業在工作性質和接觸人群這些方面都各有特色，形塑了多疑心態的強弱之別。

多疑心態也隨著在就業結構中的自雇或受雇狀況而有明顯差距。從表五的行2係數判斷，就業於私部門的受雇者，要比公部門的受雇者要來得多疑。自雇者雖然可能比受雇者更不信任人，可是這種效應也因內部雇用人員與否而異：跟公部門的受雇

表五：多疑變項的就業身份背景迴歸分析(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自變項	(1)	(2)	(3)	(4)	(5)
男性	.054	.032	.060	.019	.062
年齡組	-.092***	-.098***	-.101***	-.106***	-.089**
族群身份					
外省	-.012	.002	.005	.005	.000
客家	-.072	-.083	-.076	-.072	-.074
原住民	-.363**	-.430**	-.456***	-.441**	-.347*
婚姻狀況					
已婚	.102	.109	.107	.097	.096
離婚	.310**	.322**	.324**	.310**	.291*
喪偶	.082	.084	.111	.068	.051
教育程度	.016	.026	.020	.025	.011
個人收入	-.069***	-.065***	-.063***	-.067***	-.072***
行業					
次級	.383***	--	--	--	.312***
三級	.412***	--	--	--	.339***
自雇或受雇狀況					
自雇雇人	--	.265***	--	--	.090
自雇沒雇人	--	.104	--	--	-.055
受雇私部門	--	.134**	--	--	.032
職位					
服務及事務	--	--	.114*	--	.064
專業監督	--	--	.052	--	-.016
管理監督位階					
低階	--	--	--	.009	-.041
中階	--	--	--	.065	.061
高階	--	--	--	.286**	.196
常數	-.003	.239*	.303**	.371***	.047
調整後 R 平方	.033	.028	.024	.026	.037
樣本數	2475	2472	2456	2470	2449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就業身份各變項的對照組包括初級行業、受雇公部門、勞力工人、未管理他人。以下各表的相關變項皆同。

者相較之下，沒有另外雇用他人的自雇者並不會特別多疑，可是對那些雇用別人的自雇者來說，確實會對陌生人小心；其多疑的程度，比私部門的受雇者更為明顯。因此，說自雇者對人小心多疑，只是一般性的論述。必須同時考慮自雇者是不是還雇用了別人為自己工作，才能真正區辨出雇用型態與多疑傾向的關聯。而這種多疑心態上的差異，如何反映出就業部門中自雇與雇用與否的結構特質，則值得持續深入探究。

除了行業和雇用狀況，職位和管理監督地位也分別展現出多疑心態的變異。文獻上強調管理監督階層涉及責任較重，也接觸到較多人情世故，比較不輕易信任他人。從表五的行 3 和行 4 來看，結果跟文獻上未必一致。跟技術層次較低的一般工人比起來，位居專業監督職位的並沒有特別多疑，反而是從事服務及事務職位的比較不信任人；在職務上需要管理人的，也不一定就會比較多疑，而是依管理位階而異。跟一般沒有管理他人的員工比起來，低階和中階管理幹部對陌生人的信任態度都沒有顯著差異，只有高階主管明顯地傾向多疑。因此，文獻上對管理位階的多疑心態論述，在台灣社會的工作場域中或許需要略作修正：只有在最上層的管理者才會明顯的抱持多疑心態。

表五的行 5 將上述四項就業身份的衡量指標合併分析，結果發現雇用狀況、職位、管理監督位階這些指標的原有效應都不復顯著，只有行業別對多疑心態所造成的差異仍舊相當清楚。由於這些指標彼此關係密切，甚至多所重疊（例如三級行業和「服務及事務」的相關係數達到 0.41），一併分析未必恰當。但是分

析結果傳達了一項重要訊息：不論是雇用狀況、職位、或管理監督位階，原有的效應都給行業別抵銷，也就是這些就業身份因素都可能隨著行業別而有不同效應。其間變化到底如何，值得再進一步推敲。

表六基於這點考慮，將樣本依行業別分開，循序探討在不同行業內，職位及管理監督位階的多疑心態效應（初級行業因為樣本過少，職位及位階也不均衡，所以省略）。就整個樣本來看，專業監督職位並不比技術層次低的工人更多疑。可是分別從次級行業和三級行業來分析後，則得到相當不同的結果。在次級行業裡，職司專業監督工作的，明顯的要比一般工人更多疑；而三級行業的專業監督人員，反而比基層更沒有多疑的傾向。兩項差異恰好相反，而且都達到 .05 的顯著水準。當所有行業一併分析時，這兩個行業內的差異剛好正反抵銷，因而無法判別職位效應，只有分開來分析，才能彰顯這種差異。

再依行 4 到行 6 的結果來看，就業身份的效應因為行業別而異這種現象，同樣出現在高階管理監督人員的多疑心態，只是差別沒有那麼極端。如前述，以整個樣本來分析時，高階主管明顯的比基層員工不信任人。可是一旦分別從不同行業來看，這種兩端位階之間的差異，只有在次級行業中顯著，在第三級行業裡則不明顯（雖然高階主管還是比較多疑）。因此，前述發現所謂位居最高管理位置的會傾向多疑，嚴格說來只適用於次級行業（以製造業為主）。也就是對於第三級行業來說，原本顯示在整個

表六：行業內多疑心態的職位及位階背景(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自變項	全樣本	次級	三級	全樣本	次級	三級
	(1)	(2)	(3)	(4)	(5)	(6)
職位						
服務及事務	.114*	.325**	-.118	--	--	--
專業監督	.052	.204*	-.216*			
管理監督位階						
低階	--	--	--	.009	.152	-.159
中階	--	--	--	.065	.170	-.039
高階	--	--	--	.286**	.342*	.205
常數	.303**	.394*	.459**	.371***	.422*	.484**
調整後R平方	.024	.024	.038	.026	.022	.040
樣本數	2456	1079	1192	2470	1077	1208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族群別、教育程度、個人收入，變項名稱及係數皆未列出。

樣本上的位階效應幾乎是虛假效應。這點發現，或許正揭示出行業性質的重大區別。

由於不同行業的性質各異其趣，所接觸人群的機會也不一樣，以致職位或管理監督位階所造成的多疑心態效應不能一概而論。同樣位居技術層次高的主管或專業、監督人員，竟然會因為行業不同，而用正好相反的眼光來看待陌生人，無疑反映出這種行業間的不同特色。前述分析揭示不論是次級行業或三級行業，都比初級行業容易醞釀多疑心態。可是在同樣容易讓人對他人起戒心的這兩個行業裡，次級行業就業結構中高位階或監督人員，又特別不相信人；而處於服務業這類三級行業中的專業監督者，則反而不像基層人員那麼多疑。因為行業不同，可以引起如此南

輾北轍的職位與位階效應。像這種不同要素的互動效果，讓人進一步了解就業身份對多疑心態所能發揮的結構作用。

就業身份四項要素對多疑心態的效應，又如何跟都市效應相互呼應？由於若干就業身份特質在都市環境裡特別發達，就業身份效應有可能隱藏於城鄉結構背景中嗎？換句話說，由於都市裡的次級和三級行業特別普遍，自雇又雇人和受雇於私部門的情形比較多，專業監督和高階管理人員的比例也偏高，這些就業身份效應會是同時反映了都市效應嗎？從另一方面來看，前述明顯的都市效應，又有可能是透過都市環境裡這些特殊的就業身份因素，才得以發揮嗎？這些問題，多少反映了文獻上所關懷的另一重點。

表七將這兩大類結構背景因素合併分析，試圖分辨兩大結構背景的相對效應。無論將這些背景因素如何配合分析，最顯著而一致的發現有二：次級和三級行業比初級行業更能讓人多疑，城鎮和核心都市的居民也明顯的比鄉村居民更不信任陌生人。這兩大效應獨立於個人特徵和其他就業身份特徵之外，也獨立於彼此之外，相當清楚。換句話說，即使現居地的都市化等級雷同，在初級行業之外工作的人，仍然比初級行業的從業者更不信任人。同樣的，即使都在次級行業或三級行業工作，住在都市還是會比住在鄉村更容易讓人抱持多疑心態。經過如此反覆分析，行業別和城鄉環境的效應都很顯著，也都相當一致，顯示出多疑心態的傾向，的確跟這兩類結構肇因息息相關。

其他的就業身份因素，就沒有這麼明顯而一致的效應。例如自雇或受雇狀況所造成的區別，在加入城鄉環境一併分析後，不再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行 2）。原先自雇又雇人以及受雇私部門這兩類樣本所展現的多疑傾向，其實是依附於都市環境所引起的效應。在都市化程度相等的前題下，自雇或受雇狀況如何，並不足以有效區辨多疑心態的強弱。

表七：多疑心態的城鄉與就業身份背景分析(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自變項	(1)	(2)	(3)	(4)	(5)
行業					
次級	.314***	--	--	--	.258**
三級	.351***	--	--	--	.290**
自雇或受雇狀況					
自雇雇人	--	.150	--	--	.087
自雇沒雇人	--	-.075	--	--	-.041
受雇私部門	--	.024	--	--	.030
職位					
服務及事務	--	--	.111*	--	.065
專業監督	--	--	.045	--	-.016
管理監督位階					
低階	--	--	--	-.004	-.043
中階	--	--	--	.058	.062
高階	--	--	--	.260**	.186
現居地都市化					
城鎮	.190***	.209***	.236***	.226***	.177**
核心都市	.156*	-.190**	.210***	.199**	.146*
常數	-.054	.219	.165	.236*	-.013
調整後 R 平方	.037	.034	.032	.033	.041
樣本數	2473	2470	2454	2468	2447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族群別、教育程度、個人收入，變項名稱及係數皆未列出。

就業結構中的職位與管理監督體系中的位階效應，都獨立於城鄉環境因素之外，仍然顯著(行3、行4)，也就是都市背景並不能完全解釋職位與位階所引起的區別。但是和其他就業身分因素合併分析後，這些效應明顯減弱，變得不重要。這兩種效應減弱，主要是因為行業別的效應十分顯著，部分解釋了這兩項因素上原有的變異。因此，雇用部門、職位、管理位階這些就業身分上的特徵，雖然都有助於了解多疑心態強弱，但是跟行業別漢城相環境比起來還是有其限制。從就業結構中所處的部門和位置，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人特別不信任別人；但是要更有效地了解這種多疑心態的結構背景，還是必須訴諸都市生活環境，以及所從事的行業別。

五、結論

本文從城鄉環境與就業身份兩大面向，探討多疑心態的結構背景。多疑心態的測量，是依據在國內外其他調查測試過的一組量表而制訂。修訂後的量表置於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期第二次調查的問卷II。分析結果肯定都市環境特別容易滋生多疑心態，尤其是現居地的環境更加重要。而跟自我主觀界定的都市化分類比起來，依據各地人口社經發展指標所建構的客觀都市化分類，能夠更清楚地襯托出這種都市效應。成長地的城鄉環境並不直接引起特殊效應，但是將成長地和現居地兩者交叉分析後，顯示那些在鄉村地區成長，目前又住在都市的民眾，是最不信任

陌生人的一群。如此考慮個人歷經不同城鄉環境的時序變化，令人加深了解城鄉結構背景對多疑心態的形塑作用。

多疑心態的結構背景，又可以透過就業身份的若干特徵清楚展現。文中分別檢驗就業行業與部門，以及管理監督結構中的位階等因素。多疑心態在次級與三級行業、自雇又雇人、受雇於私部門、服務與事務人員、高階主管這些群體或分類中特別盛行。其中行業的區別最為關鍵，不但本身的效應鮮明，甚至還有力地制約著其他相關因素對多疑心態的作用。整體言之，城鄉環境與行業別這兩大因素，是了解多疑心態結構背景的重要機制。

多疑心態固然藉由大環境的政經發展與特定事件，得以盛行，更根本的源由可能還是繫於朝夕相處的環境。城鄉環境和行業別兩者，分別代表著從日常生活和工作層面所形塑的外在結構背景。從外在結構背景來剖析多疑心態，或能超越從個人特徵來分析社會心理的嘗試，也能藉此揭示社會心理得以形塑的社會力。對這種社會力或社會心理加以理解，更可以進而判別社會發展的健全程度。多疑心態多少反映著台灣社會近年來的若干亂象。這些亂象或因特殊事件而加重，或隨著政經發展而突兀，都特別容易引起注意。至於潛伏於亂象底層的不健全社會心理、藏匿於社會治安敗壞背後的險惡人心，往往都隱而不顯。像不信任、多疑、猜忌、犬儒、怨恨這些負面的社會心理，對政治文化、社會發展、人際互動這些層面，都會產生不利後果。這些因素，或許是眾多社會問題背後更為深沈的癥結所在。

本文限於研究架構、資料來源、篇幅等，無法全面分析多疑心態的背景。現有指標是否周全，分析是否完整，也值得檢討。例如迴歸方程式的 R 平方值普遍偏低（最高只到 .07），到底是反映出國內社會調查測量態度變項時一向碰到的限制、是本研究所採取多疑心態量表特有的困難、還是仍有眾多更具關鍵性的自變項未加探討，都需要再進一步檢視。此外，本研究以城鄉環境與就業身份，作為主要自變項，對其他背景變項之重合未予仔細處理。若干控制變項之間相關頗高（例如年齡組與教育程度的相關係數達 -0.42 ，教育程度與個人收入的相關為 0.34 ），因而在迴歸分析時所造成的線性重合效應有多嚴重，也必須在全面深入分析時予以注意。

在現有考慮因素之外，後續研究可以從結構層面持續分析其他工作形態，例如客觀的工作時數、待遇福利、工作自主權、監督制度、工作環境衛生等，以及主觀評判的工作滿意、對工作的前瞻、所負擔的責任、工作保障、不確定性等。藉由這些工作形態的要素，同樣可以揭示形塑多疑心態的若干背景。

除了這些工作形態要素，個人特徵也反映出其他的結構層面或社會機制，尤其是性別、年齡別、族群別這些與生俱來的賦予特徵，以及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收入這些後天成就的特徵。多疑心態如何隨著這些特徵有所變異，也都是應該擴大探討的範圍與議題。

多疑心態的研究跟信任或不信任的研究應該有所區別。多疑心態不只是純粹的信念問題，應該還牽涉到情感層次對人事、

情境的本質、動機、意涵有所質疑。本研究的實証基礎與論述或許不足以對這種現象作複雜深入的分析或解釋，但已點出重要的研究方向。後續研究應該進一步探討更明確或更為根本的議題。例如多疑心態到底是接近人格，對不同的情境或對象都以同樣的立場觀點對待，還是情境式的反應，只是調適外在環境的一時權宜之計？從概念測量的要點來判斷，這種心態似乎只是針對陌生人這種特定群體的情境反應。在微觀角度上，這種多疑心態會不會演變成個人人生觀的一部份，而對所有人事都一視同仁？持續對陌生人群抱持多疑心態，會因而回到私人親密關係中去追求信賴，以求補償與慰藉？還是會讓類似的心態滲透進個人核心網絡，連帶損及既有的親密關係？再就鉅觀層次來看，多疑的社會心理一旦形塑，又如何擔保不會持續，甚至變本加厲，損及社會秩序的基礎？要是不利的外在結構情境不變，這種心態恐怕會持續；如果外在環境一旦改變，已經盛行的社會心理又將如何能迴轉？由於其影響深遠，多疑心態不但是了解人際關係的一項重要指標，也是值得長期注意的社會議題。

參考書目

伊慶春主編

1993 《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八十二年二月定期調查執行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執行。

伊慶春、章英華

1989 〈都市意象：以台北市居民為例的探討〉。《中國社會學刊》13:43-66。

侯崇文

1985 〈警察犬儒心態測量上的評估〉。《社會學與社會工作》7: 39-50。

莊慧秋

1985 〈都市中的唐吉訶德〉。《張老師月刊》15: 31-33。

張荳雲

1997 《當代台灣社會的信任與不信任》。頁 295-331。《錄於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主編。九0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專書。

傅仰止

1992 人際關係。錄於「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八十年八月定期調查」報告，第三章。頁 44-90。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伊慶春主持，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執行。

1995 〈都市人的社會心理特質：公私場域之分〉。《中國社會學刊》18: 17-73。

1997 〈社會生活的公私交錯〉。「1997 社會學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宜蘭棲蘭山莊。

傅仰止、伊慶春

1994 〈容忍態度的結構肇因：都市背景、遷移經驗、異質聯繫〉。《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 257-301。

瞿海源主編

- 1996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三期第二次調查計劃執行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執行。

蕭新煌、尹寶珊

- 1996 公共領域的信心差距：台灣與香港的比較。頁 263-310。錄於劉兆佳、尹寶珊、李明、黃紹倫主編，《華人社會社會指標研究新領域》。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Andersson, Lynne M.

- 1996 "Employee Cynicism: An Examination Using a Contract Violation Framework." *Human Relations* 49:1395-1418.

Fischer, Claude S.

- 1975 "Toward a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1319-41.
- 1981 "The Public and Private Worlds of City Lif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306-16.
- 1995 "The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A Twentieth-Year Assessment." Centennial Essa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543-77.

Goldfarb, Jeffrey C.

- 1977 *The Cynical Society: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American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ldner, Fred H., R. R. Ritti, and T. P. Ference

- 1977 "The Production of Cynical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539-51.

Kanter, Donald L.

- 1989 "Cynical Marketers at Work."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1989:28-34.

Kanter, Donald L. and Philip H. Mirvis

- 1989 *The Cynical Americans: Living and Working in an Age of Discontent and Disillus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Karp, David A., Gregory P. Stone, and William C. Yoels
1991 *Being Urban: A Sociology of City Life*. 2nd ed. New York: Praeger.
- Kiong, Tong chee and Yong Pit Kee
1998 "Guanxi Bases, Xinyong and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9:75-96.
- Klinger, David A.
1996 "Negotiating Order in Patrol Work: An Ecological Theory of Police Response to Deviance." *Criminology* 35:277-306
- Kohn, M. and C. Schooler
1982 "Job Conditions and Personality: A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of Their Reciprocal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1257-86.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William Schneider
1987 *The Confidence Gap: Business, Labor, and Government in the Public Mind*.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ofland, Lyn H.
1973 *A World of Strangers: Order and Action in Urban Public Sp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Social Life in the Public Realm: A Review."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7: 453-82.
- Milgram, Stanley
1970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Cities." *Science* 167:1461-68.
- Mortimer, J. and J. Lorence
1979 "Work Experience and Occupational Value Socializ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1361-85.
- Poole, Eric D., R.M. Regoli, and R.E. Lotz
1978 "Linkages between Professionalism, Work Alienation and Cynicism in Large and Small Police Departmen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9:525-34.
- Regoli, R.M., E.D. Poole, and J.L. Schrink
1979 "Occupational Socializa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 Look at Cynicism Among Correctional Workers." *Human Organization* 38:183-87.

- Simmel, Georg
1903(1971)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translated by Edward A. Shils.Pp. 324-39 reprinted in Donald N. Levine (ed.),in *Georg Simmel On the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ephan, G. Edward and Douglas R. McMullin
1982 "Tolerance of Sexual Nonconformity: City Size as a Situational and Early Learning Determina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411-15.
- Stouffer, Samuel A.
1955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1-24.

**Structural Backgrounds of Cynicism:
The Rural-Urban Milieu and Employment Status**

Yang-chih Fu

Cynicism has become more prevalent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structural backgrounds of such a cynicism in terms of the rural-urban milieu and employment status, based on the 1996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II (n= 2831). The urban background, especially the current urban residence, proves a key factor in breeding cynicism. Among the current urban residents, in particular, those who came from the countryside exhibit the strongest cynical outlook towards strangers. Such a cynical outlook is also more common among those who work in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ectors, those self-employers who also hire a few employees, who work in the private sector, who work as service administrators, as well as high-rank managers. Among the factors related to employment status, the industry exerts most consistent effects on cynicism. The findings lead to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omplicated studies.

Keywords: cynicism, rural-urban milieu, employment status